

现代中国的社会风险与化解思路

袁振龙*

如果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谱系”中寻找和确定现代中国的方位，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正处在“第一次现代化”^①和“第二次现代化”^②的交叉点上^③。与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或“反思现代化”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既需要从整体上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任务，建立起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制度，还需要在局部解决好各种“现代性”问题，积极主动地推动、适应和把握好“第二次现代化”的机遇，继续完善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双重转型”的任务高度重叠在一起，压缩在“当前中国”这个有限的“时空”中，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风险如影随形，纷至沓来。吉登斯认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机遇和风险的世界”。

* 袁振龙，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研究员、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犯罪学、社会治安、社会治理等。

① “第一次现代化”是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及其深刻变化，其特点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福利化、世俗化等。

② “第二次现代化”是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及其深刻变化，其特点主要是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和信息化等。

③ 参见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①。因此，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更加复杂多样，各种“风险”转化为“现实威胁”的概率更高，“危险”可能随时出现在身边，成为现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一状况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考验着全社会化解风险的智慧，迫切需要理论界对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深刻的反思，寻求中国社会风险的防范、化解及治理之道。

一、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八大主要风险

在综合分析国内外诸多学者对“风险”认识的基础上，我国知名青年学者杨雪冬等将“风险”定义为“个人或群体在未来遇到伤害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判断与认知”^②。如果把这种“可能性”及对其的“判断与认知”拓展到“现代中国”这个大群体上，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现代中国社会至少面临着现代大生产、人口大流动、城市大建设、技术大发展、制度大转型、利益大分配、融资大变革、文明大冲突、信息大爆炸等形成的各种风险，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警惕和反思。“2014·3·8 马航飞机失联事件”、“2014·12·31 上海踩踏事件”、“2015·6·1 长江沉船事件”、“2015·8·12 天津港爆炸事件”、“2015·12·20 深圳山体滑坡事件”等事故（件）及“股市暴跌”、“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异常情况的发生，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有力地警醒着我们，各种风险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我们必须绷紧“风险”这根弦，时刻防范风险，努力化解风险，探索风险的现代治理之道。

（一）现代大生产形成的社会风险

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中国已经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4 页。

②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 页。

作为“制造基地”和“生产工厂”扬名世界。然而，发展机遇同时也意味着重大风险，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平衡产生的风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生产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主要取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在世界经济波动、需求变化的情况下，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的情况经常发生。当前，我国的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石化等行业已经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而高品质工农业产品的供给却严重不足等，这给我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带来很大的风险。其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风险。当前，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不合理，比如产业结构与就业人口严重不匹配，第一产业的产值尽管已经下降到 GDP 的 15% 以下，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数量仍然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38% 左右，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有待大幅度提升，高能耗产业、高污染企业数量还比较多，能源紧张，资源短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日益枯竭，环境、空气、地下水、土壤等被污染。这种状况意味着当前我国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不合理的情况，蕴含着能源、资源、环境等各方面风险。再次是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衡带来的风险。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关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过于强调效率，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损害了公平，导致个别社会成员“挫败感”、“被剥夺感”、“耻辱感”等较为强烈，可能形成“反社会”的心理甚至采取“反社会”的报复行动，带来了各种社会风险。最后是产品质量监管滞后导致的风险。政府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配置和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中国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现有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已经不适应大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大量新材料的使用，导致部分传统产业缺乏有效的监管，对新兴产业、新兴领域缺乏有效的规制，增加了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人口大流动形成的社会风险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的道路让中国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潮。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公布，“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 800 万人，近两年尽管我国流动人口增速开始放缓，但 2014 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高达 2.53 亿人^①，再加上其他各种形式的流动人口，每年我国人口的流动规模十分惊人。人口的流动既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人力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也让我们的社会面临且不断扩散各种风险。有学者指出，“引发风险的因素既来自自然界，也来自人类本身，而且后者已经成为风险的根本性来源”^②。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社会风险也随之产生并加速流动起来，进一步增加了现代风险治理的难度。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大量流动与互动，增加了不同文化冲突或不同群体冲突的风险，社会不适有所增加，部分社会成员越轨、违法犯罪等风险明显增加。第二，处于流动状态的大量流动人口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安全防范知识不足等因素的制约，缺乏应有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由此导致许多不确定的安全风险。第三，人口的大量流动意味着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社会秩序的重新调适，其中的调整和调适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可能对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安全稳定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风险。第四，人口的大量流动极大地增加了对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方面的需求，对交通各领域的运输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运输各领域在服务保障人口流动过程中存在各种安全风险隐患。第五，一些传染性疾病也由于人口的大面积快速流动有快速传播的风险。

（三）城市大建设形成的社会风险

自从城市出现以来，城乡关系便成为难以回避的一组重要关系，城乡矛盾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改革开放以

^① 参见陈海波：《〈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发布》，载《光明日报》2015 年 11 月 12 日。

^②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

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就业生活,城市建设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进入城市快速建设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社会风险开始聚集并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随时可能引发城市的各种安全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建设,急剧地改变了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形和结构,可能给城市及其周边的地质、气候、水文、生物等各方面产生不可逆转的环境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不断地释放出来,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确定的威胁。第二,随着大量建设的开展,由于之前规划的不足、人类的贪婪、新技术新材料的盲目应用及对未来风险的认识不足等因素,城市建设本身存在许多已知或未知的安全风险,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学习、生产、生活等形成一定的安全威胁。第三,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多,增加了对资源、能源的巨大需求,对城市资源、能源的供给保障能力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其中潜藏着许多已知或未知的安全风险。第四,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城市运行变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部门或个人都难以认识并协调其中的复杂关系,其中的某个或多个环节可能成为城市运行的“短板”,以前不明显的风险开始变得凸显出来,如城市垃圾、城市污水的处理,城市的交通系统等,从而给城市的安全运行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第五,由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及对自然地貌的急剧改变,以前远离城市的风险开始靠近城市,如以前布局在郊区的化工区周边开始建成居民区。第六,由于农村的大量人口、资源不断向城市聚集,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投入不足,一些农村地区面临着凋敝和衰败的危险,进而对中国未来农业及农产品的安全造成冲击。

(四) 技术大发展形成的社会风险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极大地解放了人类生产力,带给人类数不清的福祉和便利。同时,技术大发展本身给人类也带来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技术的广泛应用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的风险,一项新技术即使实验证明风险可控,也不等于

技术广泛应用的风险可控，因为技术广泛应用后面临的不再是实验室给定的环境条件，在改变了的环境条件下，即使是安全的技术也可能变成对我们的巨大威胁，如日本的福岛核电厂在地震、海啸后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截止到2016年1月，目前全世界在运转的核反应堆共439座，其中中国有30座；在建核反应堆24座，拟建核反应堆40座^①，中国的在建核反应堆和拟建核反应堆目前居世界第一位。可以看出，核能技术在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广泛的应用，其风险应得到有效控制，但其释放风险的概率将持续存在。第二，技术本身对我们也是巨大的风险，如转基因技术。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可能对我们的生产、学习、生活等带来安全威胁，同时，如果新技术应用后的后续处理一旦不当，可能给我们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第三，技术的发展及大量应用，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可能对我们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升形成某种制约或阻碍，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从而对我们未来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生存形成潜在的威胁。第四，大量新技术的发明及应用，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和气候，我们对这种改变的影响还认识很少，对这种改变对人类的风险还认识有限，但这类风险对人类来说可能是致命性的。第五，技术的大发展及广泛应用，也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大多数人对技术本身及其风险认识极其有限，我们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可能不如我们对技术那样自信，对技术及其风险的双重“无知”可能令我们未来某个时候处于恐惧甚至绝望之中。

（五）社会转型形成的风险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中国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制度转型势在必行。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制度转型，面临的难度都是很大的，新旧制度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同

^① 参见刘德宾：《全球在运核反应堆439座，中国在建数世界第一》，网址：<http://news.sina.com.cn/c/2016-02-13/doc-ifxmpqqt114557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2月13日。

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制度转型既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发展,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决定制度的是各种思想,制度的转型实际上意味着各种思想观念的斗争和交锋,因此,制度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思想观念的解放、碰撞与斗争,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相互对立甚至直接冲突的思想观念,如何整合并吸纳各种思想观念并成为制度转型的共同营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制度转型可能伴随着新一轮社会冲突的开始。第二,制度转型本身存在一定的风险。所谓制度转型,就是主动地从现有的制度向新的制度过渡。然而,这个过渡本身也潜藏着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如制度不适、制度冲突、制度失败……无论是哪一种风险,都可能对现有的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冲击和影响,进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安全稳定。第三,制度转型带来的风险。制度的转型,将带来一系列社会政策的调整,将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及广大人民的工作生活,是对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制度转型“试错”的成本十分高昂,由此可能导致制度转型缓慢或制度转型的失败,从而引发支持制度转型的群体不满,或者引起反对制度转型群体的不满。无论“转”与“不转”,不满总是有的,因此,必须认真调查并认真处理好人们的不满情绪。

(六) 利益大分配形成的社会风险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生产力极大解放、社会财富大幅增加的过程,也是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发展基础、发展区位、发展政策、资本条件、人力资源、资源能源、交通条件、基础设施、周边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我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明显。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也千差万别。其中无论哪一种差别,最后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在利益的调整上来。利益的调整往往伴随着各种风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现行利益分配原则造成利益分配体系不合理,特别是劳动要素在利益分配中占的比重明显偏低,而一些社会成员通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扩大了社会的不公平,导致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对现行利益分配

秩序的高度不满，部分社会成员存在“被剥夺感”。第二，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利益分配差异很大，导致发展落后地区的人才、资源向发达地区转移，大大削弱了发展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进一步拉大了不同省市、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发展过度和发展不足并存，这对国家的统一、国土的安全、民族的团结、环境的保护等都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带来了新的社会风险。第三，行业利益差距加剧了人们的不公平感。目前，中国收入高的行业与收入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已然很大，导致高收入行业，竞争力变低，寄生现象严重，收入低的行业则社会地位低，后继无人，难以为继，最终可能造成各行各业发展的不稳定，进而对社会的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第四，城乡发展差距导致的风险。目前，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与城市的发展差距已经十分悬殊，截至2014年，中国还有7000万贫困人口，如何真正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让更多的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防范社会风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七）融资大变革形成的社会风险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部分社会成员开始有了自己的财富积累，他们迫切希望通过理财投资等方式使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然而，我国传统的银行存款等渠道难以满足社会成员的投资需求。因此，我国的融资方式出现了许多变化，其潜藏的风险应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影子银行”等地下金融的大量存在冲击了现有的金融秩序和融资规则，可能加剧我国金融秩序的混乱与无序，反过来影响和破坏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我国现行的金融发展政策、金融监管方式明显不适应新兴的互联网金融、P2P、民间借贷等大量存在的现实，从而造成政府对部分融资行为的“脱管”和“失管”等现象，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猖獗，进而造成普通投资人的财产损失，引发群体性聚集和群体性上访，影响社会的稳定。第三，我国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既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能力，又打击了股民对我国股市的信心，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打击，也可能引

发群体性聚集和群体性上访。第四，现有融资渠道不畅，造成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的盛行，我国大量民间资本的去向不明确，其投资行为难以完全得到法律的保护，可能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重大的威胁。

（八）信息大爆炸形成的社会风险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互通的信息新时代，各种信息通过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迅速地传播，人类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自由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得多，人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大爆炸时代。然而，从风险的角度来看，信息大爆炸也存在诸多风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息的大量快速传播，客观上增加了人们接收信息的负担，人们被大量的信息包围，反而可能错过真正有用的信息，辨别和接收有用信息成为人们面临的共同挑战，人们普遍面临着面对信息手足无措的状态。第二，大量的信息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对人们辨别信息真假的要求提高了，但现实中，人们对信息真假的辨别力十分有限，人们受虚假信息蒙骗的机会和概率大大增加，随之产生的风险也大大增加。第三，信息传播产生的效应难以预料。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接受信息的受众看到信息后产生的反应是千差万别的，但也存在产生相同的感想和感受，人们往往会将他人的“遭遇”嫁接到自身上来，因此可能对异乡发生的某一事件形成过激反应，甚至采取过激行动，进而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安全稳定产生影响。第四，虽然管控信息的技术和能力也在提升，但管控信息面临的风险也很大，很可能使言论的不满汇聚成实际行动的抗议，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合作甚至对抗行动，对社会的健康运行形成严重的威胁。第五，信息的快速传播导致集体行动的酝酿更加方便，成功的机会更大。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员发动群体行动更加便利，使社会应对此类集体行动的压力随之增加，从而导致社会紧张程度进一步加剧。

上述几个方面只是大致地论述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实际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远不止这些，比如因为全球化带来的

风险，还有因国家利益来自国际和周边国家的风险，等等。本文集中论述上述八大风险只是为了方便读者清醒地认识我们身边可能存在的社会风险，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各类风险还可能叠加、放大、转移，并可能产生更多的次生风险。现实中风险的形成机理十分复杂，风险转化为现实危险的概率也随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不同时期而区别很大。

二、现代中国化解社会风险的不足

风险总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没有不存在风险的社会。特别是近代社会以来，“随着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风险的结构和特征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并出现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雏形”^①。风险的存在是与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和认知紧密相关的，因此，风险意识的有无和风险知识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风险的判断和认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②同时，不同社会面对风险的态度和准备是不同的，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而言，我国通过法律规范等制度设计较好地防范了各类风险的发生，但与急剧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比，我国化解社会风险的力度还是严重不足。尽管“风险”并不等于现实的“危险”，但从现阶段而言，中国社会整体对风险的认知是普遍不足的，大多数人对身边可能存在的风险是浑然不觉的，社会整体应对风险的准备也是不足的，因此一旦当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时，可能出现处置不当，造成损失过大等问题，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概括起来，现代中国化解社会风险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 ~ 23 页。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 页。

（一）发展阶段的限制妨碍了风险意识的培育

正如前所述，当前我国正处在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跃升的过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追赶发达国家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任务，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这一阶段最响亮的口号，发展经济、创新创业是全社会最重要的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社会安全防范的意识严重不足，全社会的风险意识普遍不高，大家的关注点主要是利润和金钱，“风险”尚未进入大家的关注中心，风险意识的培育更无从谈起。风险意识的普遍缺乏，意味着我们绝大多数人常常身处危险之中或危险边缘而不自知。这种状况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人口大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我国各类安全事故时常发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每年我国各类安全事故都有发生，每一次都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但依然未能成功地让全社会培育出足够的风险意识，我们大多数人依然浑然不觉行进在“快速车道”上，全然没有意识到前方的风险正在转化为危险并向我们逼近。

（二）追逐利益的冲动忽视了社会风险的存在

在这个发展至上的阶段，追逐利润似乎是众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不二法门，赚钱、赚更多的钱似乎是很多人最大的人生追求，利益成了人们的主要追求，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利润，置他人的利益特别是他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于不顾，置于公共安全利益之上，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安全风险之上，就值得社会的反思和反省了。在“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引导下，一些企业和个人开始超越道德的底线和法律的界线，有意无意地掩盖着风险特别是安全隐患方面的风险，同时不断地生产着新的风险，致使社会风险不断地积聚，有转化为现实危险的可能性。现实中，安全风险被许多单位和个人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忽略，许多单位和个人用于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的投入普遍不足，导致社会整体对风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防范，这进一步误导了人们，让更多的人误认为社会风险并不存在或风险根本不值得

关注。

（三）道德自律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放任了社会风险的扩大

道德规范一直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和规范，它主要通过善恶评价、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等来维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时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熟人社会普遍被新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传统的道德规范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制约作用。尽管国家一直试图建立并积极倡导新的道德规范，并持续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真正进入人心，并未成为大家共同认同并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由于道德自律的缺失，该严格管理的没有严格管理，许多企业该有的安全设施没有，该有的劳动保护措施没有，该有的污水处理设施没有，该启动的大气污染治理设施不开启（或者白天开启晚上关闭，检查时临时开启其他时期关闭），不该贪污受贿的贪污受贿了，不该添加的添加剂擅自添加了，该落实的质量标准落实不够，该施以援手时无人施以援手……一些企业和个人故意放任各种安全隐患的存在，故意放任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商品特别是食品药品流入市场毒害他人，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四）知识技能的欠缺降低了应对风险的能力

由于社会对风险的认知有限，因此，当前我们关于风险的知识相当缺乏，无论是从关于风险的认知还是防范风险的知识，我们都有欠缺，关于风险的理论研究也显得极为薄弱，风险知识及风险防范技能的传播也显得不足。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关于风险防范的各种技能也开发得十分有限。我们曾经遭遇过哪些风险转化为危险的现实案例，这些风险是如何转化为危险的，从这些现实案例中我们吸取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形成了哪些关于风险认知及防范风险的知识？并从实际的应急处置中催生了哪些风险防范、风险应对的技能？国外应对风险形成了哪些理论、知识和技能？全社会对这些知识技能的了解都十分有限。因此，一旦风险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时，

我们就可能手足无措，处置应对失当，结果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扩大化、风险的蔓延和次生风险的出现。

（五）防范投入的不足削弱了风险应对的能力

对风险防范的投入不足是全方位的，用于风险防范的政策、人力、精力、财力、资源等都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我们当前对风险认识不足、研究不足，政府部门对风险的认识也十分有限，相关的风险防范政策严重滞后于风险广泛的社会现实，政府和相关部门现有的人力配置难以对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监管，更谈不上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同时，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各个社会单位对风险普遍不重视，用于风险防范的人员、设备、资源、资金都相当有限，对风险发生或转化为现实危险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导致危险一旦实际发生时，我们应对风险的准备和能力显得不足，从而可能耽误风险危机的高效应对。

三、现代中国进一步化解社会风险的思路与策略

风险的广泛存在，迫使我们努力构建更加安全更加有序的社会。尽管我们对各种风险还认识得十分有限，新的风险还在不断地产生和积聚，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认识和了解我们面对的各种风险，探索完善化解风险的思路与对策，增加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的投入，从而努力使风险处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让我们的社会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让人们享受到更多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福祉。

（一）大力宣传风险防范技能知识，主动培育现代风险意识

只有大家具备应有的风险认知，大家才会有正常的风险意识。只有人人认识到风险的存在，才可能努力防范和减少风险的发生。只有人人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和应对技能，一旦我们遇到风险发生时，才能应对得当，减少损失。这有赖于我们共同努力，大力宣传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技能，让更多的人形成现代风险意识。首先，把风险教育纳入中小学和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使更多的公民从青少

年阶段开始，逐步学会识别我们身边的危险，开始养成风险意识。其次，各基层党委政府在辖区所有社会单位广泛宣传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知识，经常性地开展各种应急演练，让更多的人掌握自救、互救知识和急救技能，逐步养成社会单位和公民的风险意识，提升全社会的风险应对能力。最后，广泛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和各种自媒体，广泛宣传现代风险知识、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技能，让更多的人时时处处接受现代风险意识的熏陶，强化风险意识。

（二）积极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利益与风险并重

在继续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努力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推进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将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将风险防范设备的投入和使用作为所有社会单位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引导各社会单位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切实控制和防范好各种风险。具体说来：首先，让各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切实履行好安全隐患排查、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等社会责任，让更多的风险隐患在各社会单位范围内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防范。其次，各企事业单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在风险隐患排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各自的风险防范、风险应对和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演练，进一步提升各社会单位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最后，利用视频监控、现代物联网、云计算、云存储等技术加强对各社会单位风险防范设施使用状况的在线监控，引导和鼓励各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加强对各社会单位履行风险防范责任情况的调查和监督，形成全社会共同重视风险防范的氛围。

（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化法治在风险防范中的保障

风险防范和应对是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在加强道德自律的同时，以全面健全的法制保障全社会切实加强风险防范。首先，全面梳理和完善风险防范的立法工作，进一步完善风险防范法律体

系。当前，我国的风险防范法律还分散在不同的具体法律条文中，整体性的《国家安全法》正在制定过程中，具体的风险防范类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和操作化。其次，强化风险防范法律体系的执行与实施，强化风险防范法律实施。明确各种风险防范法律的执行机关和单位，明确风险防范法律实施的监管部门，切实强化法律实施的监管手段，改进监管方法，确保相关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最后，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提升风险防范领域违法成本。切实加大各类风险防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得到及时处置，不让风险防范的违法行为大面积发生。

（四）加强风险理论与风险防范技能的研发，为风险防范提供有力支持

风险理论的完善意味着人们对社会风险认识的深化，风险防范技能则是人类防范社会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它们在风险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加强风险理论的研究，不断研发风险防范的技能与设施，是提升全社会风险防范能力的基础性工作。具体说来：首先，建设风险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引导科研人才加强对风险理论的研发。加强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社会单位的合作力度，引导研究人才深入单位和社会，发现和分析社会风险，进一步构建、丰富和完善我国的风险社会理论，从而为我国的风险防范提供更好的理论支持。其次，加强对风险防范的技能与设备的研发力度。切实根据各行各业的风险状况和风险防范的需求，研究开发更多更实用的风险防范技能和风险防范设备，不断地推广使用，为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最后，加强风险理论的研讨与交流，加大风险防范技能与设备的推广应用。创造条件，让风险理论界与实务界有更多的交流与研讨，共同推动风险理论研究的深化，加强风险防范技能和设备的推广应用，让更多的人掌握风险防范技能，熟悉使用风险防范设备。

（五）切实加强风险防范领域的投入，提升全社会风险应对能力

风险应对能力的提升最终依赖于全社会对风险防范投入的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主要包括：首先，国家加大对风险领域的投入，包括风险防范政府部门设置和工作人员配置、风险排查和风险防范政策法律的研究制定、风险防范法律政策的贯彻落实与监督检查、执法，风险防范知识的宣传教育，风险防范理论的研究与技能研发投入等。其次，各社会单位要加大对风险防范的投入。主要包括各社会单位加强对员工风险防范的宣传教育培训，劳动安全保护的投入、风险应急演练的经常举行、劳动安全设施的完善和自觉运用等。最后，广大市民也要自觉地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等学习和了解现代风险社会理论知识，学会排查和识别各种风险隐患，学习和掌握各种风险防范和风险应对的知识和技能，熟练地使用相关的风险应对设备和工具，学习和掌握各种急救知识和技能，更加理性地认识社会和自己，努力让自己生活得更理性、对人更宽容、更有力量、更有尊严。

参考文献：

1.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
3. [德]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版。
4. [美] 谢尔顿里姆斯基·多米尼克·戈尔丁编：《风险的社会理论学说》，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5. 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6. 颜桦：《安全社会学》，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年版。